

# 关于新时代城市学的思考

## ——兼论城市问题—城市科学—城市学

Thoughts on Urbanology in the New Era: Urban Issues, Urban Science, and Urbanology

汪光焘 刘翔 李芬 魏贺 高渝斐

WANG Guangtao, LIU Xiang, LI Fen, WEI He, GAO Yufei

**关键词** 城市学；城市工作；新质生产力；城市科学；学科体系

**Keywords:** urbanology; urban work; new productive forces; urban scienc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提 要** 建立以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体系是城市研究者长期探索的方向，一直试图从学理角度搭建起城市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提供指导思想与专业知识。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城市进入新发展阶段，亟需对城市学进行系统回顾与再思考。通过回溯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始终以改革为导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外城市学或城市科学相比，我国城市学不仅倡导跨学科交叉挖掘城市发展背后的科学规律，更强调与生产力理论、国家宏观政策、城市制度改革等内容紧密结合，这是我国城市学与国外城市学或城市科学研究的本质差别。基于此，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以完善城市化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结合既有城市学研究基础，阐述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的现实意义与核心内容，提出建设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的六大重点城市科学学科体系，以期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系统性、持续性的科学支撑。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city science system led by urbanology has long been a key pursuit for urban researchers, with continued efforts to build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urbanology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to provid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urrently, China is at a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 in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which urban development plays a pivotal role. As cities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rethink urbanology.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becomes clear that reform has consistently served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imed at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mpared with urbanology or urban studies in other countries, China's urbanology not only advocat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uncover the scientific laws underlying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emphasizes close alignment with theories of productive forces,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and urban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is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a's urbanology and urban science research abroad. Based on this, and in line with the goals set forth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cusing on improving urbanization strategies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builds on existing urbanology research to expou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ore content of developing a new era of urbanology. It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ix major urban science sub-disciplines led by this new urbanology framework,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ystematic and sustainabl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ties.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503002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5)03-0009-07

### 作者简介

汪光焘，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级工程师，wgt789@126.com

刘翔，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通信作者，xiangliu@tongji.edu.cn

李芬，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魏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高渝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高效能与城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筑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城镇化浪潮<sup>[1]</sup>。城市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发展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鉴于城市工作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钱学森<sup>[2]</sup>以战略眼光,提出建立以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体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论的思维方法指导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此后,我国逐步形成了数十门包含“城市”命名的专业,如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和城市管理,各专业领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向、理论体系、技术方法与实践应用领域<sup>[3]</sup>。学界围绕“城市学”进行了持续性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学术论文、著作和教材<sup>[4-5]</sup>,试图从学理角度搭建城市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支撑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提供专业知识。

然而,既有城市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上仍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与我国城市发展取得的成就相比,城市学研究的基础性、系统性理论成果产出不够,呈现出城市学理论研究落后于城市实践发展的突出矛盾。其次,与新技术和新方法快速发展相比,城市学研究开创性和交叉性的创新成果不足,数据和技术驱动的城市规划和治理路径仍待进一步明晰。此外,城市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逐渐增多,但城市学各子学科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往往不具备统一目标或基本共识,难以体现出城市学全局性与系统性的核心内涵,导致真正以城市学为牵头的具有主支作用结构的城市科学体系仍未成型。

基于此,在钱学森提出建立城市学4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城市学进行回顾与再思考。特别是在既有城市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有关制度的改革方向,围绕我国城市新发展阶段特征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目标,提出建设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以不同城市科学学科为支撑的学科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现代化建设,系统性做好城市工作提供关键的理论支撑。

## 1 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的基础背景

### 1.1 中国城市发展有关制度的形成与改革

就一般规律而言,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sup>[6]</sup>。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由此制定的“一五”计划在新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据奠基性的地位<sup>[7]</sup>,并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发展也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制度和财税制度等。这些制度改革不仅影响了我国城乡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的城市发展内容,还形成了用改革解决城市原有体制机制与新的发展特征之间不协调矛盾的总体方法路径。

从1953年起,我国加速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决定实施以重工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设计了156项<sup>[8]</sup>重点工业建设项目<sup>[9]</sup>,将城市分为4类,对不同的城市确定了差异化的建设方针。为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目标,防止盲目扩大建设的倾向,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区划与市镇建制制度,控制着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由此衍生的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制度对后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sup>[9]</sup>。

“一五”时期除了形成以工业项目建设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外,也影响了城市发展相关制度的安排。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常包含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项目建设,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居住单元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即“单位办社会”。在实践中,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资金,征地制度为工业扩张提供土地,用工数量按照工业项目建设计划招收农民工。户籍制度<sup>[10]</sup>管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户口类型又影响到户口持有者的粮食供给、就业机会、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福利,最终逐步演变为我国城镇化

过程中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现象<sup>[10]</sup>。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推动了我国基本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策转变,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影响到城市相关制度的改革。例如:①开放的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富裕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居住工作,推动了户籍制度的改革;②流动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形成了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推动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③基本公共服务从覆盖城市户籍人口,逐步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涉及中央与地方责权关系和财政分配制度的改革;④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行政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市管县体制,我国城市政府成为特殊的城乡统筹政府;⑤伴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又形成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总体城镇格局,形成了对区域协同治理和制度改革的新要求;等等。

推动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24年的67.0%,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阶段。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仍处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进一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应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建设宜居宜业、安全韧性、智慧城市是新时代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改善。这些都是认识我国城市发展,把握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必要背景。

### 1.2 中国城市学研究的回顾和方向

改革开放后不久,国务院于1978年3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sup>[11]</sup>(表2),重新强调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sup>[11]</sup>。此后,全国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界也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借鉴国外城市建设和发展经验,展开了一系列城市相关的科学研究。

我国“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鉴于当时城市建设情况和城市规划工作的发展态势,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提出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sup>[2]</sup>,开展以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体系研究<sup>[12]</sup>。钱学森指出:①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有一个牵头的指导思想——城市学。城市学研究城市本身,城市是变与不变统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有城市学,城市的发展规划就可以有根据。②城市学归属于应用理论科学,城市学要比城市规划更理论化,但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又具有独特的实践应用导向,因此城市学处在中间层次。③城市学要研究的不单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有体系就有结构,影响这种结构的基本力量是生产力,要看到21世纪将会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④研究城市的问题要应用系统学的思想,城市不能够割离开来研究,割离开来就不成为系统。

钱学森提出的建立城市学设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学界据此开展了多项研究,形成一批学术论文、著作和教材。其中,北京大学江美球等编写的新知识丛书《城市学》<sup>[13]</sup>、哈工大研究生教材《城市学》<sup>[14]</sup>、宋俊岭等编写的研究生教材《城镇学读本》<sup>[15]</sup>等成果阐述了城市

学的一般性原理和研究内容,是城市学研究的代表作。所凝聚的基本共识有:①城市学研究城市本身,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围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研究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②城市学属于理论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中间层次,对于这样一门科学的研究,需要用系统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③以城市学牵头的城市科学体系是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知识,能够为城市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如城市发展规律、城市规划的原则、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等。

这些城市学研究的基本共识加深了我国对城市发展及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规律的认识<sup>[16-18]</sup>,也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久,我国召开了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要坚持“一个尊重,五个统筹”系统地推进城市各方面工作。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完善城市化战略”<sup>[19]</sup>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大问题之一。这些新时代对城市工作所提出的要求,既是城市学整体性、系统性理论内涵的具体延伸,又为完善新时代城市学指出了新的深化方向。

## 2 国外城市学研究及其综合评述

国外城市学的研究可追溯至1910年代,英国城市规划学家格迪斯(Geddes

P.)<sup>[20]</sup>在其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中提出,城市学既是历史学、科学,也是哲学和艺术,同时还是政治学,城市学的重点是“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所需要的城市研究,是对既往学科知识的融合,也是对城市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城市个性与精神的探索。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新进化论学派代表斯图尔德(Steward J.H.)<sup>[21]</sup>在《科学》杂志述评中指出,城市研究要聚焦城市,城市学可作为城市发展研究中共性问题与方法的科学指导。同年,“Urbanology”(城市学)作为专有名词收录于韦氏词典,被定义为解决城市专有问题的研究,如规划、教育、社会、政治等。1966年,东京都立大学矶村英一教授在日本城市科学研究会第13次大会上首次提出创建城市学的学科,并将日本城市科学研究会更名为日本城市学会,旨在建立“城市学”解决城市和地区研究缺乏综合性的问题。矶村英一在修订的1965年版《城市问题事典》中讨论了城市学与城市科学的区别,认为:城市学是形成城市科学的中心体系,但并不等同于城市科学本身;城市科学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

2010年以来,“城市科学”也常被视为研究城市本质的学科研究领域<sup>[22-23]</sup>,特别是近年来技术发展促进了城市科学的进步。新城市科学学派代表巴蒂(Batty M.)<sup>[24]</sup>提出“新城市科学”概念,并定义为利用过去20—25年内发展出来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城市科学,体现离散性、自下而上的思想及演进的视角。2021年,芝加哥大学

表1 全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概况

Tab.1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urban work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会议	时间	主要内容
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	1962年9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明确工业内部以及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协调关系</li> <li>强调工业的每一步调整都要有利于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加强采掘工业和采伐工业的生产能力,满足国防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li> </ul>
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1963年10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解决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城市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的问题</li> <li>强调所有城市都要继续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加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妥善安排劳力,协调比例关系,继续进行调整,奠定发展基础</li> </ul>
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	1978年3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重申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li> <li>提出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走有计划发展的道路;搞好城市规划,加强规划管理</li> </ul>
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	2015年12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li> <li>强调“一个尊重、五个统筹”的城市工作思路</li> </ul>

的路易斯·贝滕考特 (Luís M. A. Bettencourt)<sup>[25]</sup>在其著作《城市科学导论：城市作为复杂系统的证据与理论》提出城市科学是将城市视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一门新颖的综合性学科。此外，伴随着数字孪生<sup>[26]</sup>、大模型<sup>[27]</sup>和具身智能<sup>[28]</sup>等数字化技术在城市场景中的快速发展与应用<sup>[29-30]</sup>，从数据中学习，从学习中提取城市科学知识，运用科学知识驱动规划的分析、模型与决策，正成为城市科学与城市规划的前沿方向<sup>[31]</sup>。

概括来说，国外城市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学”或“城市科学”展开，前者注重为城市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建立基础理论，后者强调以技术方法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机理。相比我国城市学，国内外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强调从系统学视角认识城市的复杂性，倡导以跨学科交叉挖掘城市发展背后的科学规律。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城市学缺乏一个哲学思想进行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来指导城市学研究，也未将城市学研究与生产力理论、国家宏观政策、城市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这是我国城市学与国外城市学研究的本质差别。

### 3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城市发展

#### 3.1 生产力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研究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有不同的理论视角，新时代城市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力关系理论为核心理论<sup>[32-33,35]</sup>，强调生产力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而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是城市发展及其系统演进的根本原因<sup>[34]</sup>。该理论延续了既有城市学的基本共识，同时更符合社会主义长期发展方向，可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提供更具解释力和共识性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理论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

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我国城市发展经验表明，生产力理论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遵循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约定社会组织关系，社会组织关系形成城市制度安排，城市制度安排影响城市发展的传导逻辑。改革方向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标是提高人民福祉，人民福祉的提升反过来影响生产关系发展方向，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3.2 新质生产力与城市未来发展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sup>[36]</sup>。“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创新。进入新时代，我国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对生产力理论做出的又一次深化。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城市发展需要特别注重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sup>[36]</sup>。

新质生产力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本质上是“双向赋能”的动态过程：①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支撑条件；城市的规模和多样性决定了其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些需求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化和商业应用；城市发展能够促进各类要素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协同效应。②城市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和措施，优化城市的创新环境，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平台和载体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生产力革新驱动着城市功能升级与空间重构，而城市的要素集聚和制度创新又为生产

力跃迁提供土壤。未来城市要因地制宜制定策略，并通过区域协同实现整体竞争力提升。

新质生产力不仅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做出了全面和创新性的阐述，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新质动力，并为建设新时代城市学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sup>[37]</sup>。这为新时代城市学揭示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指导未来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

## 4 建设新时代城市学与学科体系

### 4.1 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的现实意义

新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转变<sup>[38]</sup>。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注定是要素聚集和交汇的中心地点。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开放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市民的文化参与和社会交往，形成了良好的城市文化和社会氛围，进而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来看，新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建设”向“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转型<sup>[39-40]</sup>。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这直接产生了对于城市认知观念、牵引举措、规划体系和学科内容的深刻变化<sup>[41]</sup>。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目标，如何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厘清实现这些目标的科学依据和系统路径，成为新时代城市学首先需要回应的城市问题（图1）。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现实意义在于：

(1)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系统科学观点深刻理解城市与生产力发展间的内涵，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认真总结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落实途径。

(2) 从整体上认识城市，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客观科学规律，指导各门类城市科学的应用理论拓展，旨在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宜居宜业目标。

(3) 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模拟城市巨型开放复杂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规则及规律,以系统性思维实现城市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精准治理,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4.2 新时代城市学的核心内容

新时代城市学要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有关要求<sup>[42]</sup>,坚持用系统科学思想和方法,研究新发展阶段城市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关键理论支撑。新时代城市学核心内容包含: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要求,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②遵照国家发展战略部署,适应新时代社会矛盾转化。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格局。④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城镇形态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⑤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具体内容要点有: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体现。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航程,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城市发展要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作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努力与贡献。

(2) 城市是国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重要引擎,经济目标是中介性的,社会目标才是根本性的。城市与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是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工作的场所,城市的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与诉求,通过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基础公共服务水平。

(3) 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未来将是智力竞争的数字化时代。信息化领域是当今全球研发投入集中、创新活跃、应用广泛、辐射带动作用大的科技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作为创新创业产业载体的城市,要发展成一座能够更好促进知识进步、产业兴盛、企业家活跃的现代化城市。

(4) 坚持守住生态底线,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将城市居住环境建设融入生态保护和建设之中,始终将生态保护的目标置于首位。城市不仅是经

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城乡关系与特征。在生产力发展初期,会出现城乡分离的现象,但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城市与乡村又会再次走向融合,逐渐形成要素相互融合的局面。

(6) 文化传承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文化不仅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特色和品质的重要标志,更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不仅能增强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更能提升凝聚力和认同感,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7) 城市是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需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集成研究方法对城市进行科学研究<sup>[43]</sup>。一方面要借助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另一方面要参考专家的知识经验与公众意见。这是城市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论,也是推动城市科学研究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

#### 4.3 新时代城市学与六大重点学科体系

由于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学科体系,才能为城市工作的开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力量。基于新时代城市学的现实意义和核心内容,在诸多城市相关学科中提炼出由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学、城市交通学、城乡规划学等六大重点学科为支撑的城市科学学科体系(图2),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提供系统性、持续性的科学思想与专业知识。

六大重点学科涵盖新发展阶段城市工作的关键领域,在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学科体系中,六大重点学科的支撑性价值分别在于:

(1) 城市社会学强调从人的角度去研究城市<sup>[44]</sup>,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特别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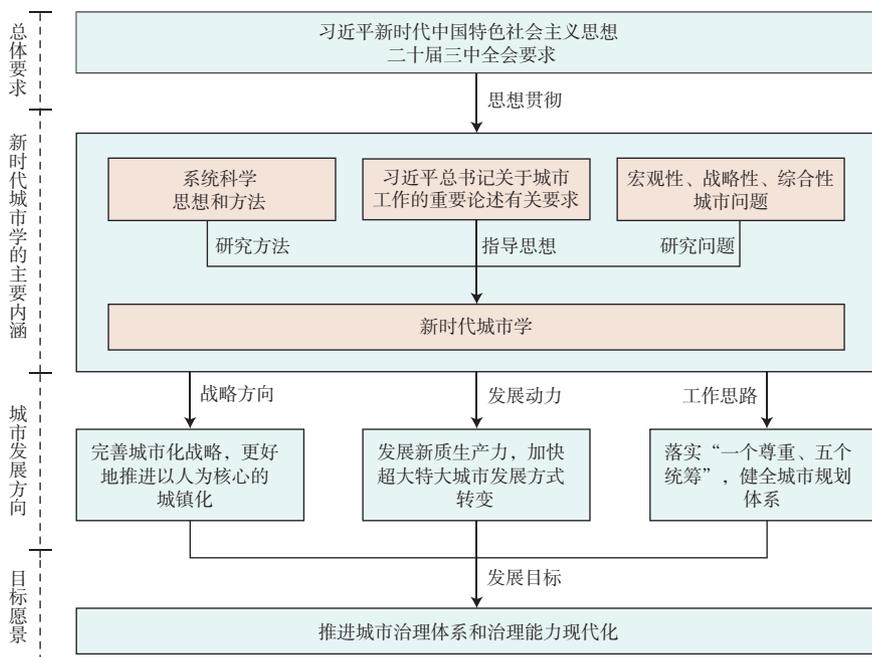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城市学的主要内涵和城市发展方向与目标愿景

Fig.1 The core essence of urbanism in the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vision for cities

序实现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体现,城市社会学能为此提供专业的知识,是新时代城市学重要支撑学科之一。

(2) 城市经济学强调城市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sup>[45]</sup>,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推动作用。在新时代城市学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引下,城市经济学研究将有利于通过城镇化释放巨大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sup>[46]</sup>。

(3) 城市生态学强调城市发展必须融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格局,是新时代城市学的重要组成<sup>[47]</sup>。城市生态学研究能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落实“双碳”目标、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关键科学知识,对城市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和战略意义。

(4)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学是传承历史文脉的新兴学科<sup>[48]</sup>。城市是文化遗产的载体,文化遗产赋予了城市独特的历史人文特色。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从更高层次认识和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经济价值,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城市交通学的核心在于研究如何组织城市可持续地高效、安全、低耗运行<sup>[49]</sup>。城市交通学从服务人的需求出发,以研究“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的三元作用机制,强调城市交通复合网络的构建与运行,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应用场景,也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和落实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6) 城乡规划学是以城乡土地利用和城市物质空间规划为核心的学科<sup>[50]</sup>。当前城乡规划学科正面临城乡规划向国土空间规划的适应性调整<sup>[40,51-53]</sup>。城乡规划学既是城市学的由来又是落脚点。土地和空间使用管理是新时代城市学的空间基础,也是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推动新时代城市学从应用理论科学走向实践应用的重要途径。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要以新时代城市学的视角审视和完善城市规划体系<sup>①</sup>,提高土地和空间使用效益。

## 5 结语

从钱学森提出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到现在已有40余年。在这期间,城市学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与倡导的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应有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回顾了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的历史背景,借鉴国外城市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创新,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阐述了建设新时代城市学的现实意义与核心内容,提出建设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的六大重点城市科学学科体系,以期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系统性、持续性的科学支撑。

## 注释

- ① 在实施过程中,有的项目被合并,有的项目被撤销,最后完成的建设项目是150项,但人们已习惯将其通称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
- ② 1985年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核心是户口登记制度。1963年公安部根据该制度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作为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发放的依据,后来逐渐演变为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
- 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共召开过四次全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是我国专门为城市工作召开的最高规格会议,为城市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是中国城市学研究 with 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 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城市规划体系,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城镇化三十年》课题组. 中国城镇化三十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2] 钱学森. 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J]. 城市规划, 1985(4): 26-28.
- [3] 王云, 田大江, 仇保兴. 城市科学学科集群前沿问题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10): 5-12.
- [4] 黄继忠, 夏任凡. 城市学概论[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0.
- [5] 段汉明. 城市学基础[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 [6] 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城乡规划学名词[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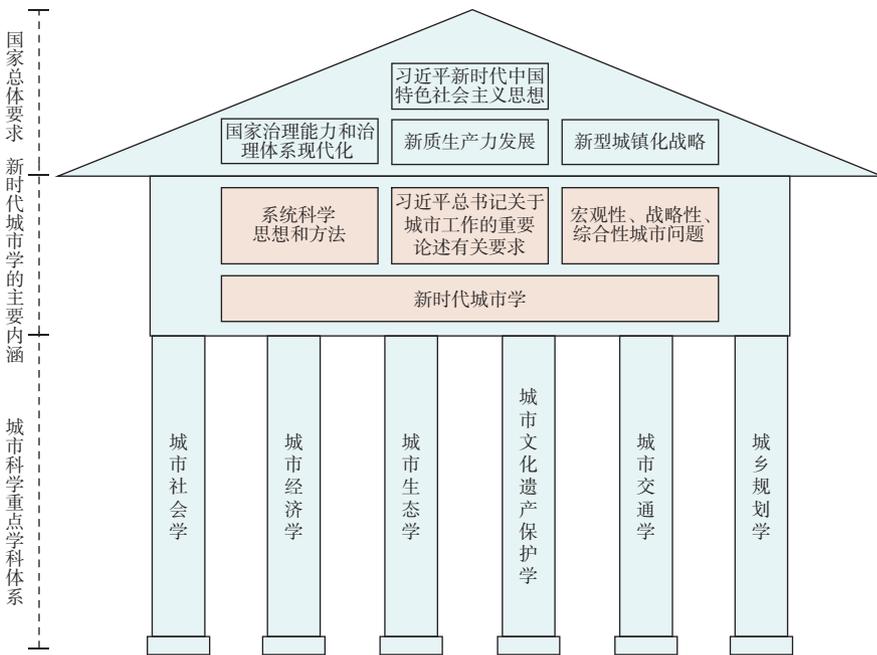


图2 以新时代城市学为牵头的城市科学学科体系

Fig.2 The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urban sciences anchored by new era urbanology

- [7] 李浩.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 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石[J]. 城市规划, 2019(7): 83-91.
- [8] 李浩. “一五”时期城市规划技术力量状况之管窥: 60年前国家“城市设计院”成立过程的历史考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10): 72-83.
- [9] 刘君德, 范今朝. 中国市制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改革[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孔祥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J]. 教学与研究, 2019, 53(8): 5-14.
- [11] 董志凯. 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J]. 城乡建设, 2002(6): 38-40.
- [12] 汪光焘, 李芬, 高楠楠, 等. 关于研究城市科学的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2): 177-187.
- [13] 江美球, 刘荣芳, 蔡渝平. 城市学[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8.
- [14] 唐恢一. 城市学[M].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宋俊岭, 马克·特佩尔. 城镇学读本[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16] 周千峙. 城市发展和复杂科学[J]. 规划师, 2003(S1): 4-5.
- [17] 田莉, 于江浩, 杨滔. 智慧人居环境理论模型与应用探索: 复杂系统视角[J]. 城市规划, 2023(12): 78-88.
- [18] 仇保兴.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韧性城市设计方法及原则[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10): 1-3.
- [19]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 求是, 2020(11): 4-7.
- [20] 帕特里克·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 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 李浩,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21] STEWARD J H. The urban focus: is there a common problem and method in studies of city development: a science of "urbanology"?[J]. Science, 1961, 134(3487): 1354-1356.
- [22] 龙瀛, 赵慧敏, 张业成. 新城市科学: 技术、计算、变革与应用[J]. 城市规划, 2024, 48(7): 4-15.
- [23] 汪光焘, 李芬, 刘翔. 城市科学研究的新机遇[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7): 978-990.
- [24] BATTY M. 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 [25] BETTENCOURT L M A. Introduction to urban science: evidence and theory of cities as complex system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21.
- [26] NOCHTA T, WAN L, SCHOOLING J M, et al.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on urban analytics: the case of city-scale digital twins[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21, 28(1-2): 263-287.
- [27] WEI C, ZHANG Y, ZHAO X, et al. GeoTool-GPT: a trainable method for facilitat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master GIS too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25, 39(4): 707-731.
- [28] PICON A. Smart cities: a spatialised intelligence[M].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 2015.
- [29] WANG K, HU J. Thoughts and explor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new era[J]. Frontier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23, 1(1): 3.
- [30] YE X, HUANG T, SONG Y, et al. Geodesig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Frontier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25, 3(1): 4.
- [31] 钮心毅, 林诗佳, 桑田, 等. 数字化规划技术: 数据与知识[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2): 18-24.
- [32]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3] 唐正东. 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新境界[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4): 15-26.
- [34] 杨贵庆. 乡村进化: 从“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看传统乡村人居空间活态再生[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3(6): 66-73.
- [3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6]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37] 王凯, 赵燕菁, 张京祥, 等. “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规划”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4): 1-10.
- [38] 汪光焘. 城市: 40年回顾与新时代愿景[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6): 7-19.
- [39] 樊杰, 郭锐. “十四五”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科学基础与战略举措[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3): 15-20.
- [40] 孙施文. 从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4): 11-17.
- [41] 吴志强, 张悦, 陈天, 等. “面向未来: 规划学科与规划教育创新”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5): 1-16.
- [4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43] 汪光焘, 李芬, 刘翔, 等. 建设现代化城市和城市科学[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11): 1894-1907.
- [44] 张钟汝. 城市社会学[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 [45] 栾贵勤. 城市经济学[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46] 吴启焰, 朱喜刚, 陈涛. 城市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47] 温国胜. 城市生态学[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
- [48]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 3版.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2.
- [49] 汪光焘, 陈小鸿, 杨东援, 等. 城市交通学总论: 兼论城市交通学的基础问题[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2.
- [50] 赵万民, 赵民, 毛其智. 关于“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J]. 城市规划, 2010(6): 46-52.
- [51] 潘海霞, 赵民.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若干辨析及技术难点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17-22.
- [52] 石楠. 城乡规划学学科研究与规划知识体系[J]. 城市规划, 2021, 45(2): 9-22.
- [53] 孙施文. 关于城乡规划学科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5): 29-33.